

A woman in traditional Hui'an folk dress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 She wears a blue headscarf with white polka dots and a red floral ornament. Her dress is white with blue floral patterns and a red tassel. She holds a large, round, woven basket with a red and yellow geometric design on its lid.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golden-brown gradient.

惠安风

惠安妇女服饰

HUI'AN WOMEN'S DRESS

《泉州惠东妇女服饰研究》课题组 编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福建省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泉州惠东妇女服饰研究》课题组最终成果

凤舞惠安

惠安妇女服饰
HUI'AN WOMEN'S DRESS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舞惠安: 惠安妇女服饰/《泉州惠东妇女服饰研究》

课题组编.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3. 8

ISBN 7-80562-988-9

I. 凤… II. 泉… III. 妇女-服饰-研究-惠安县 IV. TS941. 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9762号

责任编辑: 刘伏宝

装帧设计: 蔡淑芬

凤舞惠安

《泉州惠东妇女服饰研究》课题组 编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2层)

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89×1194 1/16开 7.75印张

字数50千字 图370张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62-988-9

G·69定价: 40元

惠女風采
中華文化

壬午年十月
刘佳景



泉州市政协副主席 原中共惠安县委书记刘佳景 题

惠東服飾
文化瑰寶

陳萬里
壬午年十月



中共龙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原惠安县长陈万里 题

宋太平興國
六年，始割
晉江東鄉十
六里置縣。

惠安縣自域圖

東至寧嶺大海
四十五里

東南至峯頭
大海五十里

比至興化府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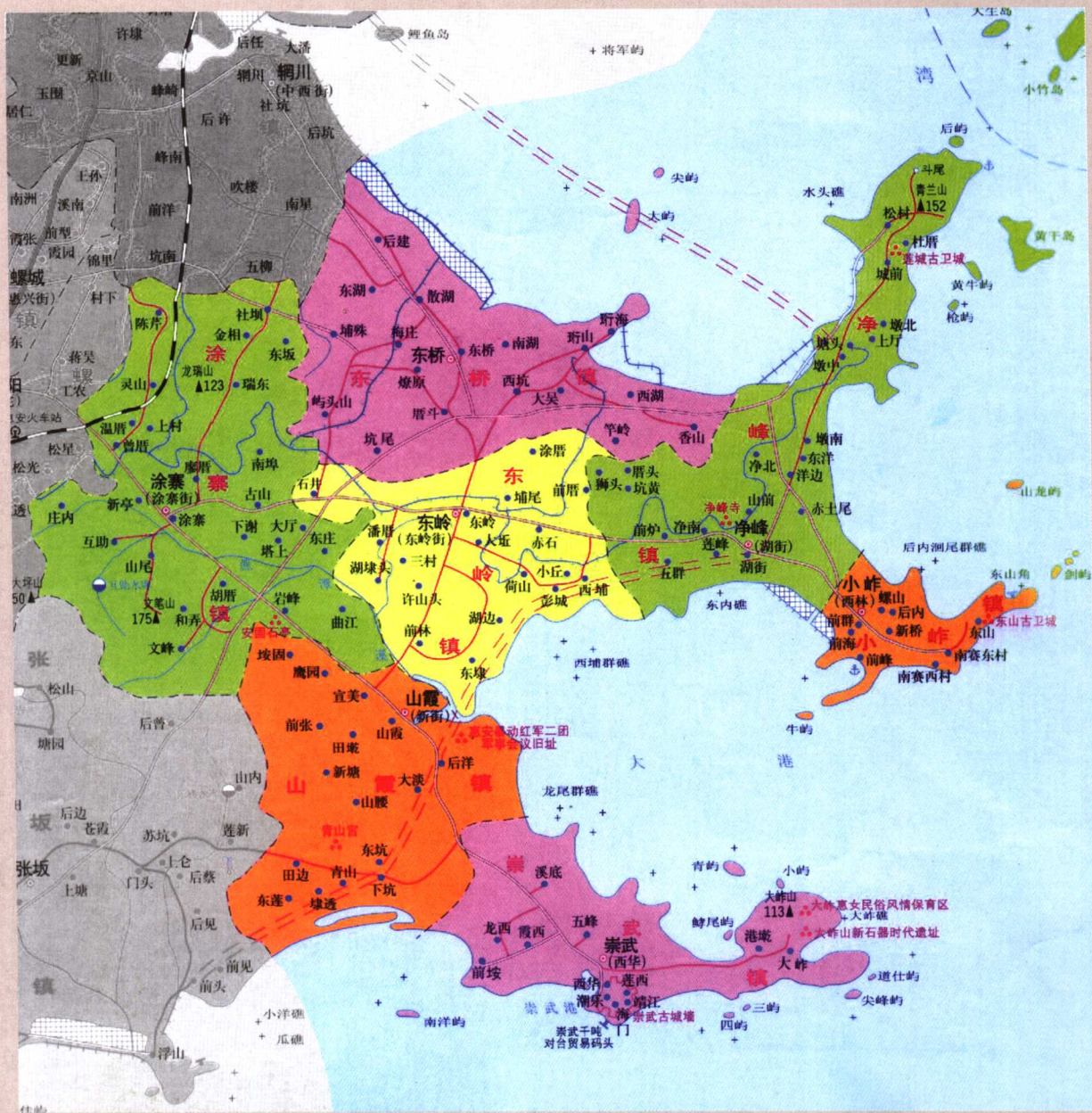
西北至晉江縣界四十五里

西至晉江縣界
洛陽橋三十里

西南至晉江縣界三十里

南至北鎮
大海四十

惠东妇女服饰存在的主要区域



序

惠安地处福建东南部，隔海峡与台湾相望，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阜天华。惠安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息劳作，自强不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财富，其中绚丽、奇异的惠东妇女服饰及迥异于汉文化的婚俗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惠安人民特别是惠安妇女的勤劳朴实、坚韧贤惠的品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艺术作品中惠安女形象的传播展示，惠安女的形象名扬四海，已成为惠安的名片之一。独具一格的惠东妇女服饰，记述着惠安先民们的文化历程，使人感受到惠安文化的深邃和灿烂。《凤舞惠安——惠安妇女服饰研究》一书从美学的角度，对古老丰富的惠东妇女服饰文化遗产多方位地进行研究，视野开阔，图文并茂，与当前对惠东民俗文化的研究互补互证，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惠东民俗文化研究中对惠女服饰系统研究的空白。这对弘扬惠安传统文化、丰富惠安文化内涵、推动惠安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共惠安县委书记 黄源水

2003年8月

目录

○序-----黄源水

○惠东妇女服饰的传承与变异-----黄 坚(1)

○惠东妇女服饰的色彩研究-----苏宏山(23)

○艺术作品中的惠女形象-----洪 峰(37)

○惠东妇女服饰纹样初探-----卫 军(43)

○惠东妇女服饰与现代服装设计-----蔡淑芬(53)

○图版----- (63)

○英文摘要----- (112)

○后记----- (113)

由于年代的久远，我们已无法证明谁是源，谁是流，不能否认的是作为古百越的后裔，他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样也不能否认，民族的迁徙、融合及汉文化的侵蚀，使他们……



惠东妇女服饰的传承与变异

黄 坚

引言

惠安女形象及其服饰由于其绚丽多彩，再加上奇特的长住娘家的风俗，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在我们的研究之前已有许多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方面和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些研究的帮助和启发下，我们拟从美术学的角度对惠东服饰的传承和变异作一番探讨，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是惠女服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又因为服饰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文献，只有再加上美术学或者其他新学科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得以更多的角度，用一种广阔的视野，科学地树立一个完整惠东妇女的形象。本文拟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我们查找一些有关资料，用一些图片资料来印证我们的观点，有时我们也曾想到，这种印证本身是否可靠，是否我们在制造一种说法，因为围绕着惠东族群衍变在学术界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族群起源含糊不清和缺乏明确清晰的文字记载的语境下，这种研究本身就显得薄弱，为此期待考古学的新发现，对我们的研究的补充，同时对本文的充实完美将会有帮助。

本文中我们仍然用一种实证的逻辑,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更强调一种相互影响,显然对族群心理变化缺乏解释的依据,但这种障碍并不妨碍我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或者说建构整个惠东服饰的变化过程。

惠安县地处闽南,与台湾隔海相望。我们所指的惠东是福建惠安县东南部,它的行政区域为现在的净峰镇、崇武镇、小岞镇、东岭镇、东桥镇、涂寨镇、山霞镇。惠东妇女服饰并不是说上述区域所有妇女服饰都一样,而是其中一部份人着此异服。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交流的互动,外出打工就学妇女的逐渐增多,上述奇异服饰着装之人越来越少。惠东服饰的特点在于妇女部份,男子服饰无任何特殊之处,故略为不计。惠东妇女服饰因为近几十年社会变迁的缘故,一些文物级服饰已遗散不见,我们的大部分实物照片,大都参考惠安博物馆所藏物品和我们所做的田野调查。

族群起源

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它涉及到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也是如何对惠东族群定性的问题。

有一些学者认为惠安东部之所以产生这种服饰,在于惠东族群起源于少数民族,是因为惠安东部曾有古百越族的残留痕迹,古百越族后衍变为许多少数民族。如,惠安东部族群应该“是百越时代生活于福建沿海地区的是为闽越族群。”^①(蓝达居,1999)“宋代,中国的东南滨海而西至云南大里,一气相通,都是峒民……蝴蝶发式是当时的族徽或图腾,是新石器时代的残遗,亦是古越人的残遗。”^②(朱飞,1973)“……而且在某些风俗习惯上也有相近似,类似长住娘家的民族有顺德布依族、苗族、藏族、黎族、高山族……百越之后裔,惠安更是百越之首闽越之腹地,同百越这些土著少数民族比,北方、中原的华夏族形成开化为迟,特别有饰齿习俗,因而惠东南应是百越之一支——黎族。”^③(陈国华,1984)这些学者的观点并不排除惠安族群的百越族身份。其实就族群的原始起源,百越族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我们福建也存在着一支由百越土著衍变而来的少数民族——畲族。所以认定惠安族群有少数民族“嫌疑”是完全可能,而且也有旁证,因为惠东族群和畲族这些均是古越族的后裔,毕竟同宗同源,在某些方面也大同小异。但这种分析探讨在于缺乏对整个历史多民族交融的可能的一种历史理解,而整个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的框架,已显示了一种纯血统、直线式的演变已被超越了,就地理范围来说,相互渗透并不存在隔阂,而在于何时

何地发生何种事件。汉化从一统中国的秦始皇时代起,就已逐步加快了步伐,所有零碎的故事被历史的尘沙所掩盖,百越族的衰落,华夏族的南逼,使当时群居在各地的土著,在原始起源上保持一种清晰的线路变得十分不可能了。

但无论持何种说法,我们应该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任何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经过迁徙、融合,民族本身的特点将会逐步减少。在惠安东部这种类型的地区,它不同于西南边疆的崇山峻岭之中的封闭的民族,外来的文化影响,外来的移民,互动的人文冲突、融合,以及人口的变迁使然,使其单独成为一种民族的可能性大为削弱。“唐末以后,泉州人口从增减的不稳定转向稳定增长……到宋元丰年间(1078-1085)中……”^④(王铭铭,1999)。王铭铭在《逝去的繁荣》一书中曾写道:“闽越人的原有经济类型包括随山而居的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生活方式、沿海而居的自然渔业以及平原地区初步的小型农业。华北汉人自三国后入闽以来,把华北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当地,对这个区域的土地进行了开拓,随着汉人农业的逐步传播,闽越人的原始经济类型渐渐被取代,同时随着汉人人口的大量繁殖,闽越人的入口被逐步边缘化,最后或在山区部份汉人结合变成边缘族群,在平原地带完全被汉族人口取代,甚至在血缘和文化上均被汉化了。到了唐初,从华北移入该地的汉人逐渐成为该区的主要居民。”^⑤虽然,族群研究许多问题是可以从民族学、文化学方面得到解释,但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王铭铭博士所提到的一个词汇——“边缘族群”(王铭铭,1999),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惠安崇武这个例子作为代表。由于惠东毕竟是古百越族生存之地(这点上已有考古学的佐证),原土著结合于南迁的汉民,血统上肯定是部分同化为汉民,加上是多个原住民族的共同影响,那么我们在研究惠东服饰和部份奇特民俗才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同时古南迁的人士也是各种混合的民族,其中也有洞庭湖畔九江一带的古越族,也有浙江会稽等地来的土著,华北河南等地来的华夏族,这些诸多方面的影响,再加上原住地土著近似顽固的生存方式、文化表达方式,使这种汉化或者同化显得并不那么彻底,也是该族群产生一些文化现象的诠释基石,所有这些在以后当地的一些文字史料上均有所记载。如

《崇武所城志》记有：“祠边苗裔初官籍，……”^⑥“莫娶邻家会稽妇……”^⑦“黎女遥看识汉幡，……”^⑧“西来土马寂天喧……”^⑨

对闽越人的来源复杂一说我们也表示同意，但惠东人士是闽越混合后产生的族群，还是土生土长的族群？我们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说法。“闽越叛乱未成而被除国徙民，因而有学者以为‘处江淮间’就是九郡东城县及临淮郡开陵县地，并有一部份闽越人被徙于济南郡和会稽郡无锡县一带。”^⑩（徐心希，2000）。这些也许迁徙到闽东南，也许有一部迁徙到西南边陲，所以在我们后面的篇章，将会有许多西南民族与惠东族群近似的例证。当然，我们从这一带的考古发现的纹样上也可以找惠东乃至闽南一带有古闽越族生存的依据，况且它们同处一个文化类型——几何印纹陶文化：“几何纹中，曲折形、锯齿形、叉形、网月形均从百步蛇背上的三角纹变化而来的”^⑪（何廷瑞，1999）而古百越族的图腾崇拜是蛇种，惠东土著人带有一种闽越血统是无可置疑的。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会稽，制定了一系列移民政策，置于余杭，置于海南，正因为这些相关因素的存在和支持，加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古闽越有部分部落是会稽、湖北一带南来的，是否有一支来惠东虽然待考，但由于海南黎族也是南下迁徙而去的，又与惠东服饰在某种程度上同宗同源，故才会有人认为惠东族群是海南黎族的一支。我们认为其实并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有相似的地方，只能在同源寻找依据，因为在随后的年代，他们其实已经是两个并行的族群了，已经再没有任何亲缘上、文化上的联系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假设，就是公元前135年闽越击南越所造成的后继影响，把当地土著的一些文化因素带回来，形成潜层次文化意识及符号。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初步认为，从秦皇汉武对百越民族的征服到唐代对土著的“唐化”，再到三王入闽等，隐约闪现出一条主线：“在区域族群人文互动过程中，作为海洋人文化代表的惠东族群不断固持自己文化的一面，保持在汉越交争中不俯首称臣的海洋文化英雄本色，而同时又尴尬地扮演了汉文化的俘虏，使得汉越族群的人文界限越来越模糊。”^⑫（蓝达居，1999）。

我们在确定一个民族的定义，需要许多前提，但最

根本的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但就服饰方面或者某些习俗的接近，还是不能定义一个民族。从惠东族群这里我们只能说它有多元文化的影响，而汉化的闽越族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情况。东汉初年汉民族的入闽，就开始血统上的汉化，这个有姓氏为证。^⑬（徐心希，2000）历史上也有记载，三国时期山越人从浙南、闽北、闽东南下，这个也许能解释畚族与闽人、惠东人的关系，而畚族又受河南、光州的影响，华夏族的入闽带来的是土著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而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两晋的永嘉之乱，是入闽汉化的最为关键时期，也许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推断惠东妇女服饰起源轮廓的一个模糊基点。古闽越族的各种残余纹样、习俗，或多或少地从一种文化的深层中泛浮起来，走到浅层上，走到表面上。我们的推断如果不是建立在惠东族群是百

越土著的一支或支系，是闽越族的残余，与西南各族迁徙前同宗同源，闽越其实属于“南蛮集团”，接近“苗瑶系”（虽然是经历的汉化，汉族的成份更大了）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惠东妇女服饰与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之间存在着那种微妙的渊源关系以及文化的“同质性”。



古越族蛇王塑像

文化原始性与汉文化影响

秦汉以后,南中国的百越族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逐步开始分化为壮、傣、黎、瑶、苗等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在其迁徙的过程中,在其为生存的征战过程中,在南中国散播着一种土著文化,而且顽强表现为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在民俗及其服饰上,这种心理积淀以一种表层符号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作为一种区域和地域的土著文化残留,不时散泛起来,这种巨古的文化符号,体现着语言学上所说的“所指”。

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断定惠东族群基本是属于古闽越族的余留,但是,无论我们从文化民俗或者衣饰纹样、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分析,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是不可能的,保持着一种土著的原始状态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认定它已是一个汉化的族群,这个汉化过程经过两大变故:“西晋的永嘉之乱及其长达百余年的‘五胡乱华’。”^⑭

(孔永松,1996)当时据称移民近百万。唐中叶的“安史之乱”,惠东族群的发生跟客家先民的产生条件是大致一样的。为此,南迁的汉族与原居住地百越族后裔,在漫长的历史中融合、互动,在宋朝基本形成一个独特的族群。汉族人的巨大数量涵盖着古闽越族,于是在血统上也发生了巨变,所以汉化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

任何文化都是先进民族文化侵蚀落后民族文化,这也是前文化崇拜后文化的结果。铁具文化代表着农耕文化,而华夏族基本上是农耕文化,为此当他们民族的进入(南迁),原居住地闽越族靠天吃天、靠海吃海的采集狩猎、讨海捕鱼的生存方式逐步地受到了威胁,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更在生活方式方面,于是带动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化,包括信仰、宗教等等。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古闽越族蛇图腾崇拜的消失。从民族学角度研究也表明惠东族群早已不是少数民族,但文化毕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从文化学研究看,惠东文化确实存在着古闽越族的残留痕迹,可是我们如果只有上述的结论,我们仍然无法解释惠东服饰的起源变异和传承。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大胆的假设来支持我们的论点,于是我们把历史视野和区域视野再度扩大,把百越族历史的多次迁徙变故联系起来,我们将会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古百越族各支系在徙迁的过程中,分化影响着各地原住土著的文化,虽然以后大部分百越族蜗居西南一

隅,但迁徙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一些僻远的地区,直至近现代仍被保留着,虽然已不是那么纯正的文化符号,但我们仍可发现与西南古百越族的同宗同源关系,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传承和变异,这种联系在有的地方很明显,在另一个地方也许呈现了一种微弱的联系:例如有古书记载:“瑶人,古人蛮之种也……妇人黥面为花卉,蜻蜓蝴蝶之状”^⑮。而当今苗族的蝴蝶妈妈的崇拜,与惠东女的发型蝴蝶架、纹样中的蝴蝶是否也有一种远古的联系。我们可以形象地比喻:姑娘嫁出去了,入乡随俗,偶尔回娘家,少时姐妹伴过来看望,看见了一些衣饰纹样,下次回夫家就开始传播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文化的传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汉文化的影响有时并不能完全改变原文化的深层的心理构架(特别跟区域范围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俗语说,山高皇帝远,这个以西南民族为例)。但在平原或者丘陵地带,影响较大,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汉文化的侵蚀并不能彻底干净地排除对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追崇,历史表明,就是唐宋时大规模移民,也无法清除这种影响,建国以来,政府曾对惠东一带陋俗进行移风易俗运动,均很难改变其风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同化与反同化相争的历史,它反映出文化的深层意义。就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以一种文化传播的路线来猜测惠东这些服饰的历史传承和变异,因为时间久远,加上考古学依据支持的不足,这种猜测毕竟只是猜测,但只要提出其中的一个答案,也许会为我们寻找或者做出文化的联系提供某种要素。因此我们觉得研究差异下的某种雷同性,使我们有可能在文化传递线条上寻找某一个特殊族群与其他族群在文化上的延绵性,也许这是当今对惠东服饰文化研究的可行办法——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或者考古上没有更新的发现之前。并不是我们有这样设想,已有许多学者把惠东族群作独立的、极端的案例^⑯(李亦园,1990)。“但可惜的是林惠祥教授和蒋炳钊教授,他们都未能确切说出,在早期汉族或明朝时汉人来到惠安之前,住在福建的是什么?也未能证明当时的民族是母系的,即使他们所讨论的壮族或布依族原有‘不落夫家’的习俗,亦不能提出他们曾在福建居住过。”^⑰李亦园教授引进“族群识别”的概念,“换言之,这是一

种籍服饰的差异，以分别不同群体的做法；不同的服饰用以族群交易关系上是一种判别的‘商标’，在族群互动上是一种辨识，在族内则是一种认同。^⑩”

于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原始文化的残留，对文化之间联系的描述，把一种关联的文化置于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具有反同化的潜文化表现形式以服饰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惠安族群（就妇女而言）开始在宋代进入我们的历史视野。

地理位置与文化的传承、变异及抵制

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惠安开发置郡是较晚的。地处惠安东南部，特别是崇武、大岞、净峰、小岞均处在环海的半岛上，是一种海岬的位置。历史记载汉族进入较迟，以崇武镇为例，唐代末年，大都从中原入闽定居，“崇武镇真正开发是从明代开始。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城后，迁入大批来自中原的官籍户（现能查证的有9姓）和来自福建漳州府而原籍系中原的军籍户（现能查证有15姓）。”^⑪军籍户也许是蒙古来的军士。“特别是郊区较早的村庄里，有跟当地土著妇女结合的可能性。这也许是这里女性至今保留较多与汉民族不尽一致的风俗的原因之一吧。”^⑫（陈清发、汪峰，1990）。

我们在谈到地理位置的这个因素时，主要是要说明惠东地理上的独特因素，影响着惠东服饰，使其能保持一个独特的文化元素，第一，地理上的隔绝性，由于位于半岛、腹地及海岬，过去交通（道路）方面的阻隔，使该区域外来的影响降至最低点，可以说近乎与世隔绝，那么文化的侵蚀便失去目标，或者说推迟了文化汉化的步伐，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正因为这种隔绝，使它的某些土著文化痕迹得以保留，也才有文化的独立性；第三，净峰、小岞、崇武，这几个地方同属一个区域，区域之中相互影响是明显的，虽然略有不同，但从历史记载看，崇武的对外开放比其他两地显得略早，作为一个军事要地，中央政府的管辖毕竟比其他地方显得快些。传说中的宋代杨文广、狄青平定闽南十八峒，开始打破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使惠东开始面向新世界——一种先进的农耕文化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影响。正因为如此，吴春明先生有一重要观点就是东南土著民族文化

是一个同源系统，但自带一种地域性的差异。在这种区域的隔绝之中，惠东人按照自身的一种逻辑发展着，更新着自己的文化，而这更多地体现在服饰上，这也是为什么惠东妇女服饰与古百越族或今西南百越后裔民族服饰有所不同的原因。同中带异，异中带同，这对复杂的关系表明了“在外在关系上，长期以来背倚华夏、西向海岛的东南土著，与周邻民族保持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文化关系。从考古学上说，与东南荆楚系统小同大异，互有交融；与西南濮僚系统基本有别，但与交界地带的滇、黔、桂间曾有较近的关系，……而与海上南岛语系的文化关系，甚至于同元一体的密切关系，在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上的证据也越发突显出来。”^⑬而最近又有中国遗传学研究所专家通过DNA研究，发现海南黎族人和台湾四个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7000多年前发源于浙江河姆渡的古代百越人。^⑭（金力、杜若甫，1998）这些新发现的证据逐步表明我们前面所说的事实，整个古百越族在远古徙迁的区域是很广阔的。崇武作为一个出海港口，也许是这些路线上其中的一个点。

不管怎样说，惠东现代意义族群的凸现，应该是宋元。于是我们又回到人文谱系当中，这个问题在吴春明先生的专著中《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曾有比较详尽地解释：

苗蛮集团	{	百濮—西南
		西蜀—西南
		荆楚—华中
		百越—东南

“苗蛮集团”民族是不同于中原“华夏民族集团”，假如我们确认这个谱系为先提条件，那么百越土著应为福建最早人士。从方言上看，海南文昌有闽南方言范围^⑮（黄典诚，1990）。“在大岞山上发现有新石器和印纹陶片，一般都认为是石器时代后期到商周闽越族遗有，证明当时有一支闽越民族部落在大岞生活着。但自此以后，就没有发现其古迹。而闽越古代记载也没有长住娘家的婚俗。”^⑯

就从这个谱系上看，我们可以推论，早期的土著与西南、西蜀、华中的荆楚土著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接下

来可能我们推论的是迁徙中的相互影响和其线路,既然“闽越”、“东瓯(越)”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现在又有DNA研究在台湾的四个民族有其与黎族之间的血统关系,那么距离并不妨碍百越之间的相互交融,而且史载的所谓“某某”越的称谓变化,其实也在传达着一种信息,“这说明周秦间发生了江浙‘越’的迁徙并与各地原住诸蛮的融合,生成‘百越’民族的历史事件”^②。汉末六朝百越又一次经历融合: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将东瓯“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六年,又将闽越“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部份人被称为“溪峒”“峒僚”就是现今的瑶、黎等少数民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百越的服装与惠东妇女服装在起源上的一种关系早在六朝时发生,这种互动的关系随着与上述民族的区域隔绝,其外在联系已变成遥远的文化的近似性,看不出在以后岁月的互动,汉文化的侵入,荆楚系统文化往华夏文化靠,而百越系统文化则远走西南。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由于中原文化的递进的速度影响,加上局部地理环境,使土著文化的变化速度也不尽相同。可能闽江流域文化率先进入是吴越文化的影响圈^③(吴春明,1999),所以在东南民族史研究中,认为“闽是福建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土著的闽文化吸收吴越文化因素形成了混合的闽越文化的看法是有考古学依据的。”^④(吴春明,1999)

从中国的历史看,文化的影响常常通过军事征服进行扩散,百越文化的扩散和传播,这其中的动因也在于此,问题在于它同时伴随着汉文化的融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王朝的军事征服又促使闽越族的汉化和闽江流域铁器时代的到来。”^⑤(吴春明,1999),但是李伯谦却认为粤东闽南是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区域^⑥(李伯谦,1981),虽与珠江、闽江流域有其关联性,由于地脊土贫,农耕文化并不十分重要,吴越文化南下,南越文化东进打破了这种区域隔绝性、特殊性和独立性,同时逐步形成融合型的文化,取代土著时代的文化。吴春明认为“南越、闽越王国的终结主要是一起社会政治史事件,并不是文化史的里程碑”^⑦,其潜台词就是,文化的延续、变异并不跟时间或者外在事件联系在一起,惠东族群可以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前进,土著的残余,百越的残余,闽越的残余,外来的影响,按照各自应该发生

的事件,宿命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不同的变异。这种残余就其他方面来说在宋元时期均于消失殆尽,唯服饰异化和传承在近千年的历史中遗留下来。持此说法有叶国庆(1934):是闽越土著的“遗俗”^⑧;林惠祥(1962):布依族、苗族为惠东同种,是古闽越与汉族融合遗留^⑨;蒋炳钊(1984):婚俗与壮、苗、布依、黎、瑶、藏的相似之处^⑩。

另外一个因素是晋江下游虽说开发较早,但惠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特例。正如闽西南的漳、汀在福建郡政县设置上最迟,惠安在晋江流域同样也是最迟设县的。古代几十公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道路,其地理环境可想而知,况且当时的时空概念与当今信息时代的时空观念大大不同。

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土著说不准确在于“人文聚落在撤离,重建的反复中更经过了深刻的变迁”^⑪,惠东现住人群都已经不是六朝隋唐以来大规模入迁的福建沿海原住汉民,它立论所建立的依据是:清初的“迁海”运动,使惠东荒无人烟,但我们认为这种运动不可能彻底,荒无人烟在某些区域可能存在,在惠东发生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而且原住民的文化影响不是以一种继承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以一种潜在影响重新泛起。就崇武而言,城内城外之分,其实视为一种变迁的结果,城外风俗服饰与城内的差别也可视为各自文化传承的异同。

综上所述,一种人文环境要求着传承必须建立在一种审美文化持久不变的方向,但传承过程必定会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体的传承和个体传承是同时发生的,变异支撑着传承,使传承有所创新。

服饰的传承和变异

虽然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表象的事实,在考古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尝试对惠东服饰的起源、传承、变异作出一种理论的假设,在这种假设的理论框架上,以求得更多的例证。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对一些历史时段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对其服饰的影响缺乏一种考古的证据,许多汉史籍对古越蛮族及其政治、文化事件存在着隐性和显性歧视,是造成这一段历史的空白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的研究系统必然出现了一个障碍,这就

是实物的确证和文史记载的确证，两者皆显得十分薄弱甚至空白，因而从这种假设之中，我们得出的只能视为一种推论或者推断。尽管如此，我们采取另外一种策略，那就是从现在的一些信息符号或者一些文化的表层载体之中努力去挖掘更深层面的东西，我们所走的第一步就从源头属古越族的一些近代少数民族服饰符号和惠安东部妇女服饰符号里寻找它们相似的构成规则。

从我们上文的研究可以基本断定惠东人群是土著也是古越族的残余，是经过历代汉化而演变的汉族人士。我们虽然把它与一些少数民族服饰作一个相似性研究，但单单就服饰而言，并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的佐证。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自己的语言等。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在惠东妇女头顶上黑布的折成一种长方形罩，并且前伸至额前后而呈“舂箕”形加上一块黑纱巾，头发用网套套住，并饰有各种金银饰品或骨饰或花饰（见图1、图4），这些型制的某些部分与小凉山彝族头饰型制（见图2）、贵州都匀苗族（见图3）、瑶族头饰型制（见图5）有所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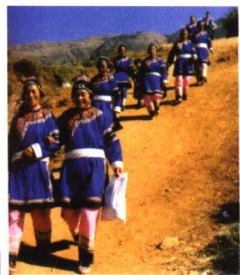


图6



图8



图7



图9

从服饰色彩上看，云南水族（见图7）、客家妇女（见图9）着简洁的青色上衣，下面是黑色裤，澄江汉族（见图6）、禄劝彝族（见图8）藏青色上衣及饰有彩色纹饰，在这方面跟惠东妇女服饰色调上有同色域的趋向（见图10）。



图10



图11



图13



图12



图14



图15



图16

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性的东西，起因仍在于古越族历史上的迁徙，这种迁徙对惠东人群或多或少是有影响，因为毕竟是同源，同属于古越族的残留部份，虽然多少年来血统演变和华夏文化的侵蚀，代表典型的土著文化的一些象征或表层符号已七零八落，但反过来说，汉化过程中，政治上、武力上的失败并不能取消在某些文化上的抵制反抗，迁徙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文化符号都能磨损消失殆尽。我们认为惠东妇女服饰的起源应是一种纪念本族历史文化象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弱势群体无意识的形式泛散而上的。我们所能追溯到惠东妇女服饰的整体样式定型于唐朝，此时的惠东人群汉化已经有一个相当阶段了，汉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宋代可能成熟，而明朝就有文字记载，在张岳的《惠安县志》中曾记有：“衣服稍美者，别藏之，有嘉事递服以出……”[35]明清两个朝代对服饰样式没有多大的影响变化，只是在纹样上丰富了惠东妇女服饰。我们在研究之中所感到迷惑的是，50年代起在服饰色彩和样式上有一种较大变化，这种突然变化究竟存在什么依据，也许是新中国的建立，新生活的开始，整个环境中人的心灵变化起主导作用？从解放初期情况看，与外界交流互动的频律并不是很大，外界的影响估计也不大，自古以来的迁徙至此也基本停顿，唯一的解释，也许是唯心的，那就是“潜意识”的那种文化纪念符号从深层里泛散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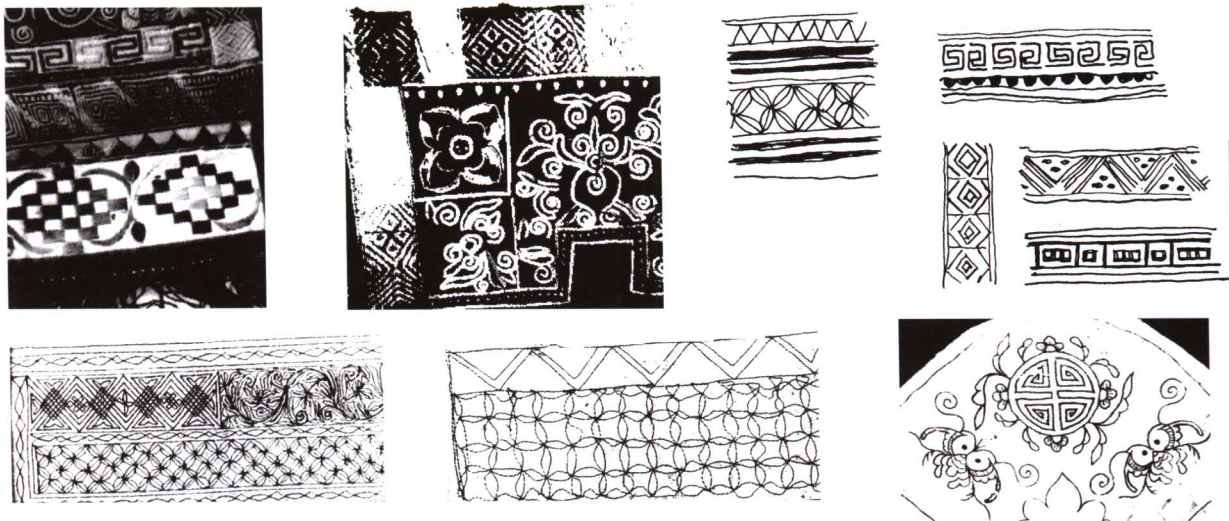


图17



图18

近代惠安妇女曾出现过百褶裙（见图15、16）及现代惠东妇女服饰（见图14），而我们在西南许多少数民族服饰上也可以追溯到这种相互影响的表面符号，如布依族的百褶裙（见图12），苗族的百褶裙（见图11）、腰饰概念（见图13），景谷傣族的银腰饰（见图17），跟惠东妇女的装饰着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见图18）。



惠东服饰纹样



古代编织纹样

唐中叶“安史之乱”汉人大批第二次南迁，开始进入闽粤赣边区后，对惠东族群的影响就开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成型于这个时期是有道理的，此时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原畚、瑶、僚、俚、奚、蛋诸族开始融化于汉民族，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吸收，使惠东妇女服饰在某些方面的源流上，从上述一些族群中

找到一些类似。影响同样是多方面，只不过惠东妇女在服饰方面显得更显著一些。例如闽西山区的吊脚楼就是受苗、瑶族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虽然现在苗、瑶等族已远僻西南一隅，表面上看好像与惠东族群联系不到一块儿，但我们历史地看待古越族的迁徙，虽经汉武帝统一，但在越人地区仍然存在着大量越人，在唐代闽西南还有“蛮僚”、“峒蛮”活动的痕迹。这些表明土著及闽越族在此时此地被汉化的滞后。

惠东妇女服饰主流源于南蛮集团的“苗瑶系”，与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文化的“同质性”，加上另外的族群互动和地理环境，使它在服饰上变异逐步远离“苗瑶系”。唐中和五年（公元885年）王潮、王审知入闽后，惠东族群互动，应该说可以告一段落了。

在这同一文化氛围里，古百越文化类型也是相近似的，如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产生影响都是相近似的，这与华夏族文化类型是不同的。从时期上看，纹样的产生演变是这样的，以编织纹样为主→云雷纹→回纹→米筛纹、填线方格纹、席纹、折线纹、小方格纹→麻布纹、米字纹。我们在惠东妇女服饰及西南古百越族后裔中的服饰也发现某些上述纹样。